

YUWEN XUEXI
2003年第4期
(总第287期)

部分作者

刘贞福,1959年生于江西南昌,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曾参与主编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并在《课程·教材·教法》等杂志上发表《建国以来中学语文教育述评》《论感悟》等论文近50篇。

黄荣华,1962年生于江西修水,上海复旦附中语文教师。曾参与编著《新语文写作》等专著,并在《现代语文》等杂志上发表《语文学习的第一要素是生命体验》等论文近20篇。

邹哲承,1961年生于湖北北京,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在《汉语学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词语的总称和特称同体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联合结构的标记》等论文30余篇。

童伟民,1937年生于浙江宁波,《学语文》杂志主编,曾主编《百部文学名著导读》等专著4部,并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盛海耕,1941年生于浙江金华,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公刘论传》《品味文学》等专著,并在国内各地报刊发表论文、翻译、随笔等70多万字。



主编:王为松
执行编辑:温泽远
副主编:孙戈
编辑部:《学语文》编辑部
主 办:上海教育出版社
地 址:上海永福路123号
电 话:(021)64373598
邮 政 编 码:200031
电 子 信 箱:seph@seph.com.cn
封 面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正 文 印 刷:上海市印刷有限公司
国 内 总 发 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国 内 订 购: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 外 发 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报 刊 代 号:4-253
国 内 统 一 刊 号:ISSN1001-8468
国 外 代 号:M209
定 价:3.00元
CNS1-1070/H

语文学习

特稿

- 4 < 基础教育是“树”,语文是“根” /唐晓云
——访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

关注

- 7 < 乱花渐欲迷人眼 /孙戈
——聚焦语文课外读本

论坛

- 13 < 争鸣 | 文学解读的三重障碍 /黄荣华
16 < 随笔 | 少读“架子书” /盛海耕
17 < 文言文是“作品”,而不是“语言材料” /陈小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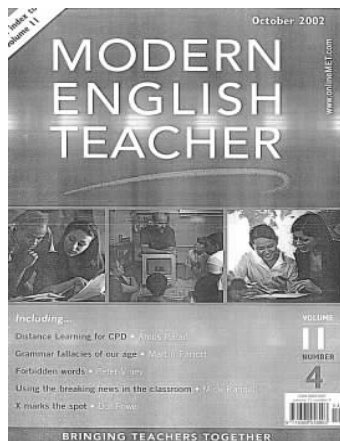
教学

- 19 < 课文视窗 | 关于《庄暴见孟子》 /陆精康
21 < 教学艺术 | 《林黛玉进贾府》:王熙凤:“我来迟了” /孙云江
21 < 《为了忘却的记念》:“潜意识”与“潜规则” /肖琦
于无声处听惊雷 /张领军
23 < 备课笔记 | 谈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 /童伟民
25 < 斜风细雨 几番喜忧 /刘贞福
——张志和《渔歌子》扩展阅读
29 < 名作重读 | 从《兔和猫》读起 /钱理群
33 < 写作指引 | 让平凡的材料焕发个性的光彩 /徐地仁
32 < 作文题库 | “书写春天”专题作文训练设计 /李百艳
39 < 阅读空间 | 英雄觅处 /徐泽春
34 < 旧文重刊 | 中学国文的教授(节录) /胡适(特约主持 赵志伟)
37 < 口语交际 | 口语交际的特质与教学独立性 /李明洁
43 < 语言丛谭 | 含助词“等”的语句 /邹哲承
18 < “定金”和“订金” /宋子纬
26 < 立名以达意为宜 /莫澜舟
31 < “长此以往”中的“以往” /李春元
38 < “光顾”四误 /宋桂奇

测试

- 44 < 解读2003年高考语文《考试说明》 /唐建新
46 < 以能力为核心,以引导学生发展为主体的语文考试 /吴逸敏
——上海市初中语文升学考试命题的建构思想

- 2 < 观点 特约主持 李明洁
3 < 声音
3 < 反馈 | 纠正一种作文坏习惯 /余喆
42 < 教育书坊
封二 < 与课文作者面对面 | 桂文亚
27 < 为什么“写” /桂文亚
28 < 美丽眼睛看世界 /徐鲁
封三 < 读书·行走 | 他像大海一样 /贝文力
封面 < 教学图片 | 大海



观点

ry”。汉语中也有类似的口误,如主持人将“笛子独奏”说成“独子笛奏”。

研究认为,这些口误不是任意的,他们的发音都符合语音模式系统。这说明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发音方式存在着不同的阶段。尽管大多数人将口误看作是发音失误,有人却提出这是大脑在组织语言信息时出现了疏漏造成的。

以上例子提示我们,人类的大脑具有处理语言的功能,正确的语言表达需要大脑正常的活动方式来支持。

(刘蕴秋 编译)

[英]《语言研究》

George Yule 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类思维与语言变化的相互关系

文化是从社会获得的知识,语言则是在文化传递过程中习得的。因此,语言变化与文化差异密不可分。世界文化研究表明,不同的群体不仅有不同的语言,还有不同的世界观。

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认为,语言的组成机制决定了人们的世界观,语言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现成的范畴体系。语言决定思维,即人们思维的范畴不超出语言允许的范围。在这一点上,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es)正与该理论相合。如沃尔夫所说,“我们按照本族语的规定范围分析大自然”。

但是,语言决定论忽略了一个事实:人类不是继承固定的语言形式,而是继承了驾驭和创造语言的能力,从而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果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变化就是不可能的。而事实是,人类不断改变语言来满足描述新事物的需求。因此,是人类驾驭语言,而不是相反。

(刘蕴秋 编译)

特约主持 李明洁

[英]《现代英语教师》

2002年10月号

将“911事件”引入作文课后的反思

Mick Randall 博士是专业的英语教师,并从事教师培训的工作。他曾经将“911事件”这样破坏性的新闻引入作文课。他将有关该事件的新闻照片挂在黑板上,要求学生以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份记叙内心的感受。

从语言训练的角度来说,这节课是相当成功的。学生会积极地去收集有关事件的各类报道,会要求老师提供更多的信息。作文会有话可说,内容充实。

但是,班级里有三位同学假想自己就是恐怖主义者,在作文中表达了不同于美国价值观的看法。文章内容充满暴力幻想。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引发了诸多反思:

作为语言教师,是不是只要提供各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来帮助学表达思想?教师有什么权力影响和改变学生的思想? Randall博士进一步质疑:我们为什么将语言学习变成世界价值观教育,而不能为学生提供一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中立的表达方式?

(荡妮 编译)

[日]《每日新闻》

2003年1月27日

掌握社会动态,补充教学内容

日本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女学

馆的中学国语教师菊池阳子女士在教授教科书内容的同时,把报刊报道的内容融入课堂的教学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学习夏日漱石的《心》、森鸥外的《高濂舟》等关于人生、生命的课文时,她引入了某报纸关于《自杀有罪吗?》的读者投稿栏和学生们一起讨论,使学生们意识到“自杀是一种逃避,但是如果不改变逼人自杀的社会环境,自杀就不会减少”,“自杀者和家属都是痛苦的,自己要能够理解别人的痛苦的人”等。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也为学生提供了诉说自己内心感受和倾听别人心声的机会。菊池老师说:“虽然时代改变了,但是中学生那种多愁善感的内心没有改变,教师应该为学生准备一个倾心诉说内心感受的场所,而许多报刊的报道都会拨动学生的心弦。”为此,菊池老师每天都要浏览一下各大报纸,寻找可用的内容。

(青野英美 编译)

[英]《语言研究》

George Yule 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口误产生的原因

说话时人们偶尔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大脑和语言生成不能协调工作。口误就是一例。口误造成语言表达混乱,例如把“make a long story short”说成“make a long short sto-

●从一池水减少到了大半池水。

——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称，由于高考时间提前到6月份，课时减少了，所以高考命题的范围也就相应地要缩小，但缩小的只是命题的取材范围，从一池水减少到了大半池水而已，与难易程度、题量、考试时间都没有必然关系。（《南方日报》2003-1-10）

●作文不是玩文字游戏。

——写作文真是件让人头痛的事。学生嘴边没话，肚里没货，只好在作文词典里东拼一句西凑一段，勉强做成一件百家衣。这怎么行？！有位特级老师说，写作就是要教会学生用笔说话，不是玩文字游戏。（新华网2002-10-16）

●木兰不是中原人。

——木兰尽忠为“可汗”，木兰替爷属“出征”，木兰将士擅骑射，木兰乡亲入“军书”，木兰征战到中原，就连木兰的“花”姓也属附会。这些都表明，木兰不是中原人，只是传入中原后，被加工成了“混血儿”。（《文汇报读书周报》2002-2-22）

●备课别忘了备学生。

——不备课怎么上课？老师们都知道深挖教材、读透文本有多重要，可却总不免会忽视学生。这就好像要制作一件雕塑品，已经选好了工具，制定了方法，有了基本构思，却还不了解材料的特质。你该怎么下手呢？（浙江三门县城关中学倪中勇老师来信）

●教我一个套路。

——你听到过这句话吗？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老师最好能教我一个像数学公式一样的作文套

路，只要将材料代入就能组合成文，获得理想的分数。这种声音让语文教师听了还真有点尴尬。不是吗？（浙江富阳市第二中学姚海婴老师来信）

●今天，你“主动”了没有？

——这里的“主动”是指教师自身的主动阅读、主动思考和主动参与课堂。如果教师自己都不“主动”，那“打开学生的思维”不就成了了一句空话？（浙江诸暨中学陈鉴霖老师来信）

●对暴力“童趣”说不！

——把捉来的小四脚蛇放入罐头盒中用火烧，看它们扭曲、挣扎；把捉来的蜻蜓从尾部抽出腹脏，再插入一小截细棍，以观赏它们载重飞行……这是学生在作文中叙述的“童趣”。如此血腥、残酷，是祖国花朵的趣味吗？（新疆且末县中学郑素霞老师来信）

纠正一种 作文坏习惯

从孩子一进入小学学写作文，我们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正规系统”的作文教学。我们绞尽脑汁把各种作文的窍门灌输给学生——反反复复告诉他们该怎样开头、怎样过渡、怎样结尾，强迫他们记住数不清的成语、形容词，要他们抄下大段大段的优美词句……恨不得总结一个“作文公式”，让学生们一套即得。

可是，若干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作文的“公式”也根本无处可寻。经年累月，学生们甚至在我们的鼓励下养成了一种作文坏习惯——不停地堆砌所有想得起来的形容词，努力把一个个句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强调的目的，才能更加确定清晰地表达思想，甚至以为叙事要生动、说明要准确、论理要肯定就必须有华丽的装饰，而毫不理会这种装饰是不是必要。事实上，往往那些不必要的装饰使学生的表达变得拖泥带水、不知所云，使学生在无谓的词语夸张中变得麻木，以致忽略了文句本身要表达的意义。

《语文学习》2003年第3期重

刊梁启超的旧文《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节录）》就是在提醒我们作文最起码的规矩：“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地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同时，这段旧文也说明了养成上述坏习惯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有话在肚子里要说才作文，乃是因为要作文才勉强找话来说。”为了弥补“勉强找话”的尴尬，我们可怜的孩子便只好拼命地装饰每一个句子。

由此我们认为，作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孩子“定出个立脚点”，发现日常生活中那些想说、值得说、想写、值得写的东西。有了想说的东西，才有可能确定什么该说，怎么说。

甘肃 余喆

基础教育是“树”，语文是“根”

——访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

唐晓云

某杂志今年2A号刊出一篇署名文章,提供了一组数据——

调查显示,近几年某市的语文高考考分:2000年120分以上(150分为满分)的考生占1%;2001年120分以上的考生仅占0.4%;2002年130分以上的考生仅区区7人。而另一项统计显示,一些重点中学的理科班,高考数学平均成绩可达130分,物理平均成绩也可达125分左右。

文章写道,高考文理科成绩悬殊,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语文学习存在投入高、考试效益偏低的现象,影响了高中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于是作者呼吁:语文教学亟待走出尴尬。

文章刊出,反响不一,为此,本刊记者访问了于漪老师。于老师并未就文论文,而是从语文教学的生存状态、发展空间,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肩负责任,乃至整个语文学科——母语教育的地位、功能、作用等一系列话题,阐述了她深邃而宏观的见解。

语文的“尴尬”是怎么形成的

唐:我读了《走出尴尬》。文章中的“调查显示”与结论性的话语——“语文学习存在投入高、考试效益偏低的现象,影响了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引起了不同看法,有的还比较强烈。于老师,您是怎样看的?

于:语文教育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有外部环境的,也有语文学科自身的。《走出尴尬》的作者意图通过“数据显示”激励语文教师进行改革,用意是好的。但数字不能说明问题。学科性质不同,班级组合标准迥然有异,怎能凑合在一起比较,又怎能据此得出科学结论?我们先来看语文学科的生存环境,再来谈语文的“投入”和“产出”问题。眼下多数学校对高中生在数理化、英语学科上教学时间的投入、课外书面作业的分量与给予高中生语文学习的时间,两者差距之



大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没有可比性。

唐:您的意思是,一些学校在不同学科的教学课时安排和分配上,已经有了很大悬殊,语文明显不敌数理化英,谈不上应有的“投入”,反过来却索要语文的“产出”。

于:是的,这是语文学科在目前学校里的生存环境。用不少老师的话来说,语文学科已经沦为“小三子”“小四子”“小五子”。问题不在于排位置,而在于思想上重视不重视。《走出尴尬》一文中的“参照系”用了理科班。理科班学生数理化学习是强项,他们有数理方面的天赋,更有课程设置和教学投入的优势,成绩考得好,应该是顺理成章;考得不好,才是怪事。理科班学生是怎样选拔出来的?主要看理科水平,得奖情况,对于语文,基本形同虚设,有的只作参考,有的索性不计。这种现状实际上是由教育内部的某种价值观造成的,这种事实上的评价与选拔制度,人为地把语文推到了一种尴尬境地。少有人真正重视语文,却有众多的人来要求语文的效率。

唐:也许我们难以否认这么一种现象,即对不同学科投入相同的教学时间,其学习效益确实有所不同。比如,对高三学生增加一定的课时强化数学和英语,很可能高考总分因此而提高二三十分,而语文则很难。语文水平(或曰成绩)的提高远没有数学和英语明显。

于:您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有位校长在学校教工大会上曾直言不讳地说:“语文有什么用?数学、英语加班加点可提高二三十分。”其实,这样想的人不少,他不过说出来罢了。语文自己也想摆脱困境,也想走出尴尬。但要想摆脱困境,走出尴尬,首先就要搞清楚为什么会有困境,会有尴尬?是社会和学校的价值取向,对待考试的功利主义态度,把语文推入了尴尬境地。口头上谁都承认语文重要,实际做法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令人悲哀。

唐:学校领导人的偏好,往往能决定一门学科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怎样看待一门学科,也往往能凸现出学校

领导人的教育理念。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学校领导人对待语文的态度,可以成为检验他的办学思想的一块试金石。

于:完全可以。有些同志不了解语文学习的内在规律性:需要“投入”,但“产出”慢,而“产出”是长效的,语文一旦形成能力,就不会忘记,不会衰退。为了求知而进行的阅读,现在被大量的机械操练所取代,学生回到家里就是没完没了地做书面作业,解的习题成堆成库,语文学习的空间和时间已经被赶到一方极其狭小的天地,有的几乎无天地。没有时间读书,谈什么投入,靠什么产出呢?语文是一项系统工程。学生在课内进行精读,在课外则应广泛浏览。我不止一次强调,语文的重要组成是读和写,不读不写就是对语文学习的釜底抽薪。学校图书馆里的书是比以前多了,可学生和老师的阅读并没有增加。语文素养不能有效提高,讲考分岂不本末倒置?

唐:我记得您在以前的访谈中强调过母语教育的作用。您还说过,“母语教育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须臾不可分的”。

于:实际上,现在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母语教育。母语教育对本民族的下一代具有精神哺育的功能,母语教育不完全是技能技巧的训练,受教育者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就应受到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情绪、民族文化、历史以及民族未来发展等等的哺育。

办教育者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如果把基础教育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语文学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因为语文是影响人的一辈子的。一个人,不论他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语文都将陪伴他的一生。一个人如果想要自己将来的生活之树枝繁叶茂,那么就一定要有非常壮实的根,而这个根就是语文。壮实的根要靠大家培育。我不是推卸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责任,我承认语文教学本身存在不少问题。

唐:那么,就请于老师谈语文教学本身存在的问题。

语文教学需要责任和灵性

于:一下子难以说周全,只能举其要点谈一谈。只有语文教师把语文看作是学生终身发展不可替代的东西,他才会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其中。语文教师尤其需要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内涵丰富,其首要的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教学是文化底蕴的展现,人格人品的折射,千万不能只满足于做知识的“二传手”。我认为学语文是需要灵性的,教语文同样也需要有灵性。教师首先要对教材有深入的理解,教材也会对教师自身产生审美作用。如果教师对作品不能准确深入地有所感悟,没有自己独

特的体验,又怎么能够以自己的讲解感染学生?又怎能有效地指导学生学呢?要坚决摒弃靠一本教参进课堂的局面。如果教师自己对教材没有独到的见解,一知半解,浮在文字表面,不注意独立思考,不下功夫独立钻研,很难想像会上出合格的语文课,更不用说能与学生心灵沟通,激发学生旺盛的学语文的求知欲。

比如,赵鑫珊的《爱因斯坦与艺术》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教这一课时就不应局限于某些词句的推敲,更不是为爱因斯坦加上几顶桂冠,而首先应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章。其实这篇课文的主旨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呼唤。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文精神正在滑坡,时代需要科学,同样需要人文,需要二者的统一。可以这么说,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大学者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者的高度统一。这篇课文的主旨显然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呼唤,授课教师如把握这一点,课的亮点就会闪现光芒。又如梁衡的《跨越百年的美丽》,讲居里夫人的故事。居里夫人是非常美丽的,她拒绝种种诱惑,执著于科学研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当她登上领奖台时,大家都非常惊讶,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人竟然是这么美丽的女子!居里夫人正因为有科学的献身精神,才能有跨越百年的美丽,才可能使获奖的瞬间成为历史的永恒。只有教师自己受感动,只有这样深入地理解文本,才真正抓住了课文的要旨,才能够激起学生追求的愿望,不尽的遐想。语言文字再也不是卧躺在纸上,而是站立起来,对学生诉说衷肠了。

唐:选入课本的文章多是经过时间锤炼的好文章,多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哲理,对这些文章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教师有文化底蕴和相关知识的支撑,需要深刻的思考后才能获得。

于:是的。如果教师自身的积累很丰富,就可以在教学中左右逢源、出口成章,教学语言不是大白话,它包蕴文化的和智慧的含量。我还非常强调教师要引导学生与作家、作品倾心对话。心中要有学生,要尊重和珍惜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学生对作品未必都会有很深刻的、比较全面的理解,但有时会冒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想法,教师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与借鉴。能者为师嘛,这就是教学相长,对教师而言也是一种极其生动的学习。总之,语文教学要多一点脚踏实地,少一点形式主义。

唐:说到形式主义,我就想到目前依然盛行的“公开课”。评职称要上“公开课”,教研活动离不开“公开课”,而且每逢“公开课”,必用“多媒体”……

于:对语文课而言,不要惟多媒体是用,为用而用。我听过不少公开课,多数课给我留下的是很肤浅的印象,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课堂上,虽然花花草草,但随

着声波消逝,也就销声匿迹,没有人学生的心。现在的滑稽情况是,如果不是“公开课”“观摩课”,那整堂课就只剩“灌输”;一旦有人听课,则气氛活跃,因为教师在事先作了彩排。教学模式基本还是“灌输+训练”,这对语文教学、尤其对学生的教育是非常不利的。

呼唤主流文化对语文的重视

唐: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和择生以及中考高考的招生选拔制度,是否对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于:不少家庭的家庭教育走样了。

唐:现在从小学生开始就有名目繁多的奥林匹克数学班。办班的人员复杂,以“竞赛”“加分”为诱饵,多数家长不知底细,多把“奥数”作为一块“敲门砖”,用它去敲开重点学校的大门。我在想,一旦某天“奥数”不再具有“敲门砖”的功能,还会有人热衷它吗?

于:尽管教育行政部门一再强调要淡化“奥数”竞赛,小学阶段不准搞,但有些人我行我素。一方有利可图,一方期望值高,而招生和选拔的某些做法造成教育指导思想的偏差,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对家庭教育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一直强调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各有侧重,不能错位。家庭教育,过去一直重视素质养成,但现在普遍存在两大问题:轻素质培养,重技能技巧;轻全面发展,重分数成绩。

我曾听到过一件事。学校里两个孩子争吵起来,一个孩子竟然咬了另一个孩子。问他为什么咬人?他回答,是妈妈告诉他“如果别人欺负你,你就咬他”。这样的事例令人震惊。家庭教育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忽略了,还讲什么全面发展?我们正在提倡“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的培养应该是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开始的。现在家庭中大多数家长挂在嘴边的就是“如果考不取就如何如何”,或直接用金钱来刺激学习。我年轻时在中学教书,大多数家长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对孩子做人的要求非常高。有位家长是老工人,他自己没读过书,但他教育子女首先要求他们学会做人,现在不少的家长只讲成绩好不好,别的都无关紧要。

唐:社会是否也应承担更多一些责任,或者说,社会应更多地营造和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给学生以良好思想哺育的同时,又提供大量品质优秀的语文读物。

于:一个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是什么,非主流文化是什么,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非常大。每年书出版很多,但好书有多少呢?最近又有一本书上了排行榜的榜首,卖得非常好,但这本书讲了什么道理呢?我看很难说。从思想的深邃,语言的规范,行文的流畅等任何方面看,都谈不上。学

生学语文是很可以从社会文化的传播中吸收一些养料的,而现在主流媒体大量充斥的是适合市民文化口味的娱乐性内容,对青少年而言,这种熏陶是属于低层次的。至于媒体上的错别字,半通不通的语言比比皆是,不用说文字本身对学生的负面作用,就是对母语极不严肃的态度对学生也起消极作用。恕我直言,现代学校中的育人功能正在日渐下降,而社会大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则逐渐上升。过去人们对学校有一种神圣感,认为那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殿堂,对教师有一种崇敬感,认为教师无私,倾注心血培育学生。而现在,学校和教师在人们的心中有何地位呢?神圣的光环没有了,理想的色彩暗淡了。教师是教人求真求善求美的,教育的本质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无数教育家都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一点千万不可忘怀。

唐:走出语文的困境和尴尬,既要改善外部环境,也要优化自身素质。我们分析“步入尴尬”的原因,目的就是“走出尴尬”。

于:要尊重学习语文的内在规律,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积极,自主,就会水到渠成,豁然开朗,学习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一个人的特点是不同的,学科的学习规律也不尽相同。比如种树,松树和柳树是不同的树种,其生长规律和周期也就不同。吕叔湘先生曾把语文比作农业,相对于工业而言,它不是程序化,不是流水线,而是潜移默化、潜滋暗长的。语文尤其有与时俱进的特点,语文教学要把握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并努力使之融合。即使是文言文教学,也还是要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评析去理解。从这个角度说,语文教师教了多少年语文都是新教师。语文教学不能只是继承,更要发展,发展就是创新。我们一直把哥德巴赫猜想称作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如果把能力比作皇冠的话,那么创新就是能力皇冠上的明珠。

唐:精彩的类比!于老师,能否再问您几个简单的问题?比如,您的教育信念是什么?

于:教了几十年的语文,我一直在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语文教师要有自信心,要努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

唐:您最讨厌什么?

于:最讨厌机械操练,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人“物”化了,扼杀了人的灵气。

唐:对眼下正在进行中的课改,您有何期望?

于:现在语文教改新教材编写方兴未艾,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学就会立刻改观。人的因素第一,语文教改要通过教师来实施,不能仅仅满足于教材的改进。

(孙戈 整理)

乱花渐欲迷人眼

——聚焦语文课外读本

本刊记者 孙戈

阅读是语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外阅读在中学生阅读中所占比例自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减负”以后,“课外”就成了拓展学生能力、拓宽学生视野的广阔天地。一时间,书市繁忙,版本众多,各种各样的语文课外读本,真让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对这样一种读本现象,如何认识,如何引导,就成为一个人关注的问题。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读本,什么样的读本才是真正提高学生能力的读本,怎样帮助学生选择读本等等,都需要思考和回答。

聚焦语文课外读本,本刊邀请有关专家,各抒己见,结合编者的认识,综合如下。文中所谈可谓见仁见智,我们只提供一个认识的角度。

读本:应运而生

秦兆基:阅读的应考倾向是功利化社会的必然产物,不足为奇。

林泽龙:中学生阅读趋势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值得深思、令人忧虑的一面。

李同兴:读本热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社会可以接受,家长可以承受,学生可以忍受,出版社和编者乐于接受。

读本的大量出现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它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小学的“减负”措施是造成读本现象出现的一个因素。减负,给了学生时间,也给了读本空间。

但减负断不能成为读本大量涌现的主要解释。大量读本的涌现还有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就是目前中学生阅读状况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秦兆基总结了中学生课外阅读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配套读物或推荐的读物要求过高,学生认知水平跟不上,可以利用的时间有限,难以阅读;二是从个人兴趣出发,阅读的范围狭

窄;三是阅读应考的痕迹过重。

秦兆基是资深教育工作者,苏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退休后一直活跃在语文教育界,还参与了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素养文库》的编著。谈到以上的问题,他说,像《论语》《歌德对话录》这类书,语文教师读起来都觉得很难,而《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收入《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是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的代表作,研究生还要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还有托夫勒的《从混沌到有序》(选段)(出处同上)是一篇自然哲学著作,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一般高中生的认知水平。这样的作品学生只能敬而远之,而教师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指导。而学生因为见识有限,并不理解课外阅读是为了增进人文感悟,丰富知识积累,扩大视野和提高思维品质,他们或迷于武侠小说,特别是所谓的新武侠小说;或耽于阅读琼瑶式的言情小说;或追逐时尚,一味读一些文化快餐式的作品。这些倾向对学生精神的健康成长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至于阅读的应考倾向,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功利性的社会必然会有这样功利性的现象,不足为奇。

林泽龙则用“七化”概括了目前中学生阅读令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目的功利化,兴趣随意化,内容娱乐化,方法快速化,方式自主化,手段网络化和效果一般化。林泽龙是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理事,中语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经参与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制订和通用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林先生认为,中学生阅读的趋势有符合时代潮流积极的一面,也有值得深思、令人忧虑的一面,但无论是哪一面,都对我们的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首当其冲的是语文教学和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要应对社会上对语文教学的不满和批评,还要贯彻落实既要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又要大力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还要跟上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体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更要考虑如何用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来武装我们的青少年。于是,各种课外读本“应运而生”。

“读本热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利益的驱使,实际上却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李同兴用这样的话表述了他对读本现象出现原因的思考。

李同兴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对于读本现象有着自己的见解。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遭到的抱怨比较多,有人将学生语文水平普遍不高归结为两点:一是考试制度的指挥棒把语文引导坏了,二是不称职的老师把学生教坏了。在李同兴看来,这种结论是不够客观的。他认为学生语文能力普遍不高其实另有原因,这就是,在知识量剧烈膨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感官刺激越来越多的今天,单一的传统学科在总的学习时空中所占的比例必然越来越少,而功利性相对小的语文学科尤其如此。大量阅读能提高语文素质和人文素养,这毫无疑问,但是要学生像我们的前辈那样,把语文学当作学习生活的大部甚至全部,在今天已经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那么,既要多读书,又没有可能多读书,就构成了一对比较尖锐的矛盾。而调和这一矛盾的方法就只能是有选择地阅读,增加短平快的阅读。这样的方式,用李同

兴的话来说,“社会可以接受,家长可以承受,学生可以忍受,出版社和编者乐于领受”。在他的眼里,这才是读本现象的深层原因。

应该说,读本现象的出现,以上各家之言,都颇有道理,不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情势使然,读本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出现的,对此,我们不应有什么怀疑。

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学生:关注网络文学,阅读取向多元,目的娱乐化,要求阅读快感,阅读能力强。

教师:开发和启蒙美好人性,构建人文精神,取材广泛,编排新颖。

编者:名家经典,内涵丰富,有可读性,有时代感,适应学生阅读兴趣。

既然读本的出现已经成为必然,那么编制高水准的读本,就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什么样的读本才是高水准的读本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读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学生提高整体素养、达成自我建构呢?我们于是碰到了标准的问题。

说到编选标准,见仁见智,学生有学生的标准,教师有教师的标准,学者有学者的标准。为了探讨“标准”,我们特意编制了一些问卷。以下就是调查的一些简要情况。

学生。

选材五花八门。这是学生调查结果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这也是学生在多元社会中多元取向的一种表现。学生们喜欢阅读的东西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各个方面,就文体而言,随笔、传记、小说、散文、科普、寓言、文摘;就内容而言,美学、地理、武侠、科幻、游记……真正是无所不包。但总结学生的喜好,有几点值得关注:

对于网络文学的关注。我们注意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网络文学中有精品存在,《第一次亲密接触》所引发的网络文学热潮,以及国内文学网站的文学专栏,都对学生关注乃至喜爱网络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种新的介质,网络实际上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接触文学的方式。但网络的限制少、内容新的特点的确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这一



点,恐怕大多数人都认同。

其次,阅读取向的多元化在学生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反映。学生可以喜欢《哈利·波特》,但同时也喜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战争与和平》;喜欢金庸,也喜欢托尔斯泰。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些学生还喜欢读国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映特定时期历史的小说。20岁不到的学生也研究《同性恋亚文化》。用传统的一元的眼光看学生的审美趣味是行不通了。

第三,学生普遍对课外阅读持欢迎态度,但主要用于消遣的居多。在调查中有的学生甚至写出自己喜欢的阅读材料是“一切不同于教科书的书,一切不同于教科书文章的文章”;有的学生钟情课外阅读是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阅读,可以没有老师强迫你回答问题,可以不用概括中心内容划分层次”,由此推想,教科书给学生形成了多么大的负担!以教科书为中心展开的课堂教学又使学生感到多么的无奈和厌倦!教科书的编制者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到更多的启示呢?

第四,学生对阅读材料的要求普遍是有趣,轻松,细腻,心情化,生活化,幽默,世俗,新鲜,不颓废,等等。多数学生不喜欢深奥的文章,即使理论书籍,也应该“深入浅出”,“不要刻板地讲理或是目的性强烈地记叙政治观点”,要关注“人性、心灵、社会问题”。有的学生将对阅读材料的要求归结为要能带来“阅读快感”,而这样的快感则对阅读材料文字和内容两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五,学生具有非常强的阅读能力。通过调查我们看到,有的学生已经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的学生则非常欣赏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杜拉斯等作品具有较深刻内涵的作家,也有的学生阅读了数学家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相当的学生正在读《世界文明史》(或许是教师推荐的缘故),这些作品都是有相当深度、相当难度的作品,堪称经典。相当数量的学生愿意读经典,但多数学生阅读经典都碰到了不太容易读懂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造成学生远离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提出应配合经典进行阅读指导的要求。

从以上对学生的调查来看,由于教科书本身的不足,学生普遍欢迎课外阅读,因为课外阅读可以“有利于自身素质培养,增长见识,丰富课余生活,使思想成熟”。在他们看来,读本是否优秀要看能否引发阅读的兴趣,而我们正可以从他们对阅读的态度和取向中,发现他们对读本判断的标准。

教师。

学识和阅历的关系,使得教师对读本的要求不同于学生,但如果仔细看,这些不同其实又有所关联。

从功能来看。教师普遍认为优秀的课外读本应该对培养学生美好的人性有开发和启蒙作用,应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构建。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关注,应该是教师对多年教学的总结,也是语文教学的趋势。

从编写来看。所有的教师都突出经典与时代的结合;不应只突出文学,还应该有更广的文化内涵,科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应有所涉及;选文可以略超过学生的接受度,让他们跳一跳可以尝到甜头,但跳得不能太费力;编排体例上要新颖,要符合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规律。

在调查时我们特别向接受调查的老师询问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学生应该用多少精力在课外阅读上(时间分配)?接受调查的老师不约而同地说:学生只要每天抽出半小时在文本阅读上,长此以往,必有收获。但现在的中学生普遍喊没有时间。对此,上海光明中学的李新老师引了朱光潜先生上个世纪写给中学生的一段话:“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扪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看来,教师对于学生“没有时间”的抱怨,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编者。

参与编写课外读本的人对读本编写都有着相近的态度。

《课外语文》的编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翔平很简要地用几个字概括了自己选文的标准:一是名家名篇,二是贴近中学生的阅读兴趣,三是具有现代性和时代感。

《走近经典》初中版的编者李同兴也将自己的选文标准归纳为三点:一是要经典。其中应该包括经典作家的作品,即公认的名家大家的作品;还有经典话题,比如谈读书、做人、求真、自然等;此外还应是语言精练,言简意赅的作品。二是要涉及到人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要有可读性。

《语文素养文库》的主编秦兆基在选文时遵循五个标准:一是健康,有积极意义,有较丰富的人文内涵,能启发青少年思考人生,有助其精神成长;二是要体现“与时俱进”的观念,站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

反映当前科学研究的成果,或能体现当代人的价值观、人生理念的;三是能有助于青少年知识积累和语文素养丰富的;四是适应学生阅读兴趣和接受水平;五是经典与时文并重,不薄古人爱今人,不只看名气,不追逐时尚。

《课外名篇》在编写时是围绕“名”“精”“新”三个字来做文章的。“名”即名家名篇,“精”即精选精文、精心选编,“新”则强调观念要新,视野要新。

看了这样一些“标准”,我们是不是有些“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呢?可以看出,对于读本的要求,大家都不外乎这样一些要求,即人文性与科学性,知识性与可读性,前瞻与回顾,包含健全的人格、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理念,现代的理念,全球的视野,时代的精神,等等。标准有了,好的读本出现了吗?

内容:经典与人文

《走近经典》:名字占得先机,注意读写结合,经典性强,视野开阔。

《新语文读本》:有人文底蕴,对阅读建议精心编写。

《课外语文》:文学性强,兼及科技文化作品。

为此,我们有意识地选取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读本,我们的评述大都基于这几种读本。

《语文读本》,配合人教社教材编写,为广大师生所熟悉,不再赘述。

《课外语文》是近两年较早出现的语文课外读本,发展到现在,以《课外语文》为名的杂志也已诞生,足见其影响之大。作为该书主编的两位知名作家王蒙和刘心武分别用两个公式概括了这套书的特点:“课内语文”+《课外语文》≈“语文全面素质”,《课外语文》=阅读能力+作文能力+应试能力。来看一下书的大致情况。课外语文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每年级一册,充分考虑到了各个年龄层次学生的要求。体例安排上,每篇文章前面都有一段“导读”,目的是“重点培养学生把握整个文章宗旨的本领”,并对部分作者提供了简单介绍。在每篇文章之后,有供学生加深对文章理解的“思考与练习”。丛书还充分利用了书中的空白处,补充“咬文嚼字”或者相应年级段的古诗词。

《课外名篇》请著名作家王安忆和梁晓声担任主编,作家臧克家和语文教育专家曾祥芹担任顾问。全套丛书按所收文章题材划分,兼顾初高中的分别。初中有小说、散文、诗歌和必背古诗文四卷,高中则在初中四种题材的基础上,增加了随笔分册。体例上,每篇

文章前的“面对面”对作者进行了介绍,“妙语锦囊”则收作者的一段话,文末的“锦上添花”则或补白,或赏析,或介绍背景,有的篇目后还有空白,编者称为“我的留言板”。

《新语文读本》由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福辉以及著名学者王晓明担任主编,具体编委则汇集了国内知名的语文教育界人士。该套丛书的中学部分共12册,初、高中各6册。书中的内容按专题划分,篇后或专题后都有专门的“阅读建议”,对学生进行阅读的

指导。

《走近经典》由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主编,由在一线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知名教师或大学教授担任编委。全套丛书初、高中各6册。内容上按照专题进行划分。每一专题前都有“导语”,用诗样的心情文字,对专题进行解说;每一专题后则有“知识卡片”和“拓展要求”,分别补充相关知识和对相关问题进行延伸,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现代语文读本》由著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黄平以及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担任顾问,由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和詹丹担任编委。全套丛书共4册,也是按照专题划分板块。专题前有“阅读提示”,专题后则附

相关文章,备扩展阅读之用。

李同兴认为现在市场上编得较好的读本是人教社的《语文读本》和广西的《新语文读本》。作为《走近经典·初中文化读本》的副主编,李同兴对现行读本的评价比较公允。但在他看来,许多读本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太偏重文学,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学语文不等于学文学,人类文明的精华不都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教育培养的人文精神是不完全的人文精神。相对于世界文明的框架和格局,他觉得中国人更需要弥补的是宗教情怀,哲学精神,科学意识,而不是文学修养。多读文章不是为了只懂得文学,还要多关注人生,多关心社会,多关注未来。

于漪主编的《走近经典》初、高中文化读本,被范守纲看作是“经典性强、视野开阔”的代表。范先生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青少年写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目前正担纲上海市二期课改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他认为这套丛书的选文以文学作品为主,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广为涉猎,使学生吸收丰富的营养,于身心发展大有裨益。谈到王蒙、刘心武主编的《课外语文》,范先生认为其文学性强是一个特点,“兼及中

外作家,兼及科技文化作品”。在接受《语文学习》采访时,范守纲认为各家读本都较好地把握了国内外作家作品的比例,而不同于过去外国作品只是“点缀”。“这反映了视野开放的时代要求”。

在各家读本中,《新语文读本》颇受关注。有人用“三新”概括其特点:教育理念新,选文眼光新,编排方式新。但实际上,这并没有点到《新语文读本》的点上。作为该丛书的主编,学者曹文轩介绍该套丛书时就表示,该套丛书让人看出了什么叫“眼光”,宽容的态度和苛刻的眼光体现了其不同的立场、意趣、宗旨和格调。范守纲从读本如何适应学生心理需求方面认为,《新语文读本》独具特色。在他看来,《新语文读本》选文的题材和主题力求同青少年心理发展同步,让中小學生有亲切感、认同感,从而激起对经典作品阅读的兴趣。

以上所述,都是学者、编者之言,那么实际上使用这些读本的教师和学生,又是怎样看这些读本的呢?

有相当的老师比较推许《新语文读本》。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谭轶斌老师就向学生推荐了这套读本,她认为这套丛书选文很有人文底蕴,而且很新,很少在其他读本上看到,很有品位;单元设置也与众不同,感觉上是先有文章再设单元,而不是先设单元再填充文章;阅读建议活泼而大气,甚至纸张的颜色也很有特点。有的教师还认为该丛书的单元标题就充满了亲切感,人情味很浓。

还有很多老师认为最能够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是《走近经典》。因为从体例上来说,这套书很好地注意了读写结合,选文既注意到了题材风格,又努力贴近青少年的生活,专题板块的设置都是考虑到学生实际,从写作题材及表现角度等方面进行考虑的。通过对这些经典篇章的阅读可以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尤其是模仿本能。读与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和语文教学的目的不谋而合。上海光明中学李新老师表达了上述观点。从教学的实际出发,以阅读能力的切实提高为目的的《走近经典》得到了老师的欢迎。

由于条件所限,有的学生并不能接触所有上述的读本,为此,《语文学习》特编制了主要的几种读本的目录(按照进度各选一本),随调查表下发给学生。如果学生没有读过其中任何一种读本,或是教师也没有接触过任何一种读本,那么学生会喜欢哪一本?教师认为学生会喜欢哪一本?根据对篇目安排的认识,调查结果中各个读本的分布相当均匀,只有《走近经典》因为占了名字的先机,更受学生关注,这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对经典阅读的渴望。

反响:冲击与忧虑

范守纲:得法于课内,得力于课外,课内外结合是学习语文的必由之路。

钟启泉:内容应该精选,编者要权威,尊重学生主体,是读本给我们传达的几个信息。

文化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生变形、变异和变质。

读本出版失去控制要引起注意。

读本的出现从社会的反应来看,取得的效果是积极的。语文教材编者范守纲就为之“欢欣鼓舞”。他认为,课外读本层出不穷,既有全国课程改革大背景的促动,也反映对语文教育重视积累的规律的认同。从课本编者的角度看,他认为,“得法于课内,得力于课外”,课内外结合是学习语文的必由之路,众多优秀的课外读本的出现,为广大师生所欢迎,也是课程教育改革的需要。

范守纲的话已经提到了课程建设的层面,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对此有全面的阐述。钟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也是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专家工作组的组长。在他看来,读本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对旧的教材观念、教材制度的一种冲击,它的出现非常有价值,也非常必要,它给社会和整个教育界传达了这样几个信息:一是教材的内容应该是精选的。过去的语文教材往往政治化、成人化,甚至口号化,而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教材的平庸化。这样的教材,学生不要看,因为它像白开水,没有什么文化和文学的意味。这样大一统、平庸化的教材对学生是毫无感染力可言的,对学生没有任何教育作用,起的只能是反教育作用。二是教材、读本的编者一定要是权威的作者,因为权威的作者有视野,有学识,有品位。但是多年来,教材好像谁都可以编,有经验就可以编,这样就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的泥坑。而这样弄出来的东西也是白开水,是阅读垃圾。三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材从来都把学生看作被动体。我们出台了新的课程标准,真正好的教材,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不要“灌输”,采取灌输教学手段的教育工作者,根本没有把学生当人,而是当狗,就是巴甫洛夫行为主义概念下的“狗”。过去我们迷信机械主义,否定学生主体的作用。而读本的出现,有历史的发展价值,形成了历史的冲击波,对社会和教师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然,也有人对读本现象心存忧虑。钟启泉教授就认为,文化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生变形、变异和变质。有的出版社短时间内就连出两套读本,其质量值得怀

疑;而有的读本将目标指向应试能力,这样的导向就有问题。钟教授非常担心出版社会不负责任地去迎合应试需要,纯粹为了赚钱而出版读本,他认为社会要建立一支书评队伍,抨击出版市场的不良现象,当然也包括读本出版中的不良现象。“我担心,读本会出得越来越滥。出读本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失去了控制,没有一个‘度’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就要引起人们注意了。”钟教授不无忧虑地说。此外钟教授还非常尖锐地指出,对于读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主编是真主编,他们真的参与到读本的编写过程中,为读本出谋划策;但也有些是假主编,他们只是挂一个名字。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大力抨击。社会需要诚信,读本更需要诚信,作为名人,绝对不可以去骗学生。

后话:反省与思考

辅文:引发兴趣,指示门津,开启思路。

选择:学生要自己选,教师要帮助选。教师应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世界观。

达标:读本距离理想状态还很远。读本要向教科书挑战。

读本现象的出现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值得反省和思考的地方,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的读本出版才会健康地发展,学生才会有更多高质量的阅读材料,他们的综合素养才能真正从文本的阅读中获得提高。

思考之一:辅文怎样做

学生由于能力和水平的限制,对一些文本,特别是经典,都普遍存在阅读障碍,这时,辅读文字就显得非常重要。辅读文字的好坏,直接影响一本书的质量。对于辅读文字,李同兴直言不讳地说,有的(读本)搞了许多点评、旁批,看上去有利于阅读,其实不然,有些甚至是在玩文字游戏,是为阅读而读。而好的辅读文字,应该有语言的感受,也应该有知识的补充,思维工具的引领以及思维品质的训练。范守纲认为辅读文字有三个作用:引发兴趣,指示门津,开启思路。语文课外读本,既是泛读本,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不同于语文课本;又是选读本,编者有引导意图,不同于学生的“自然阅读”。从学生的反馈看,必要而精到的“点拨”,学生是欢迎的,也是必要的。

思考之二:读本谁来选

学生对读本的选择是多元的,教师对读本的优劣也有自己的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学生的判断标准和教师的判断标准之间是有差异的。多数教师认为学生在选择什么样的读本方面的判断力并不完全可信,要由教师推荐和辅导才行。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占压倒多数比例的被调查学生都认为自己愿意由自己来选择课外读本,当然老师偶尔的点拨他们也不反对。可以想见,如果学生并不欢迎教师推荐读本,那么教师的努力根本不会起到什么实际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个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教师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其逐渐建立和培养起健康的审美观和正确世界观。有了这个作为基础,学生选择读本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思考之三:看上去很美?

不可否认,编制读本的都是教育大家,或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的专家,他们对于编制读本的标准一般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问题是,有了好的标准,就一定能编出好的读本吗?李同兴坦言他编成的读本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远的路。

其实我们并不是苛求读本的完美,我们只是想读本能在最大限度上接近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这里,钟启泉教授的话或许对读本的编制有所启发,他认为,读本应该对教科书进行挑战,给教科书的编制形成一种压力,并且把这种压力转变成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了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相信编制出的读本一定是值得信赖的高质量的读本。

秦兆基先生读中学时是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那一时期读的书相当杂乱,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据他回忆,当属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和赵家璧主编的《新文学大系》,此外,老师推荐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也都对秦先生后来走上文学批评的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在秦兆基先生看来,课外阅读在他成长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胜过老师,因为它可以“长相厮守,耳提面命”。

语文读本现象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对语文读本的思考绝对不限于上述表述,而对读本现象进行思考,是为了阅读乃至语文教育能够更加健康地得到发展。语文关系着整个青少年的人格成长,在培养青少年人文素养的过程中,其作用首当其冲,整个社会都要来关注语文教学的改造。这正是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

(除文中提及的人物外,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上海复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浙江江山中学的郑逸农老师、上海建平中学的张强老师对本文的撰写亦有很大帮助,来自浙江江山中学、上海杨浦高级中学、上海建平中学、上海复旦附中、上海光明中学的部分同学参与了我们的调查,谨此一并致谢。)

文学解读的三重障碍

复旦大学附中 黄荣华

文学作品大量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着实让人高兴。但面对这么多精美的食粮,教师如何与学生共享,却成了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不少师生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依然存在着三重障碍——政治泛化、道德强渗、科学阉割。因了这三重障碍,文学解读活动便不是使学生走近文学,而是相反:离文学越来越远。

—

将文学政治化,在我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由来已久。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诗三百》做了政治课本。”汉之后,这种用政治图解文学的旧传统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现代。鲁迅及其作品受到某些“左翼”作家政治“围攻”“恐吓”“中伤”和“泼污”,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显例。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顺应时代潮流”,把一部《水浒》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观照之下,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显例。延及“文革”,这一“传统”发扬到了极致。影响至今,就是文学解读的不自觉的政治泛化。具体表现为:政治的二元对立,成了解读文学的隐性的普适性“规律”。当然,这种“规律”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外来影响,那就是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长期“熏陶”。内外结合,这一“规律”几乎就成了许多语文教师的潜意识(事实上不独语文教师,一些专家、学者也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少人早就指出,不可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不可用政治的眼光观照文学,语文教师们也都赞成这种观点,但许多教师一走进课堂,就又走进了固有的观念中,那种早已流淌在血液中的意识形态,使他无法跳出“用政治眼光观照文学”的文化圈。于是,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总是不自觉地将其置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去观照,总是不自觉用地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研究作品“歌颂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总是不自觉用地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评判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巧拙……即用政治化了的阅读心理去解读文学,去寻找作品的“革命因素”与“时代局限”。这样,自然就会简单化地将作者、作品及作品中的人物最终归入某一阶级、某一阶层之中,

也就自然地将一些政治术语如“定理”一样地加在作者、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上。

有两个大“定理”至今还在课堂上通行无阻,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一个是“封建时代的黑暗”。这两大“定理”又推导出了许多小“定理”,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比如“封建官场的黑暗”“封建宿命论”“唯心主义”“封建伦理”……我们不能否定“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封建时代的黑暗”,但我们不能将这样宏大而抽象的政治理论随便就加之于一篇文学作品之上。

李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些参考书和一些教师至今还把“反映作者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对权贵的不妥协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消极遁世的思想”看作它的主旨。这就把颇具“李白精神”的伟大诗篇变成了图解政治理论的道具。从这首诗作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这样几种“李白精神”:一、满腔抱负蒙受莫大挫折后,借神奇山水引发的喜悦来超越悲郁的自我;二、梦游富丽堂皇的山水神迹,与其说在游仙,不如说李白是以自己阔大的文人情怀在召唤山水的精魂;三、“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是把世间的名缰利锁视若虚无而达到精神自由之后的返璞归真;四、“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是精神自由之后心灵对生命兴味的许诺;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生命强度的集中体现,它以傲骨嶙峋,显示着人的尊严;六、上述五点的综合,是李白精神中天人合一精神的高度融合。长期以来,我们把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李白精神”的伟大诗篇,简单类化为一两句政治口号,是多么悲哀啊!

巴尔扎克的小说《守财奴》,一些参考书和一些教师一直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作它的主题,把作品对笃信基督的葛婪的颂扬看作是作者世界观局限的体现。这就完全掩盖了小说的文学性。正如余杰所言:“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人性的贪婪和愚昧的一面。这是人性共有的弱点,不是某

种社会制度专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这样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里照样存在。”“《守财奴》的作者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而是暴露人性的弱点,进而寻找对人性的疗救之道。作者最后找到了宗教,宗教能否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当然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不当对别人指手画脚,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余杰《阉割外国文学》)

类似上述的例子还有许多,无法一一列举。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反对从政治学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但笔者以为,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是一些专门家的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的历史,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史,这些见解都是政治家解读得出来的。事实上,文学现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多角度、多层面解读的,鲁迅先生论《红楼梦》命意的名言和西方那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文学,其危害是非常明了的:将充满生命底蕴和人生意趣的文学作品简单类化为一些标语和口号,不仅对文学本身构成极大的伤害,还使学生从根本上形成对文学片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更使学生在这样的“熏陶”下逐渐变成一个“政治人”,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的语言日益泛政治化。比如现在许多学生的作文充斥着假大空的语言,有的甚至如时事报告一样,空泛的说教一套又一套,就与此干系甚大。

二

文学解读的道德强参与政治泛化一样,也是由来已久。宋人将《诗经》理学化尽人皆知。闻一多先生是第一个掀开千百年间强罩在《诗经》头上的道德迷雾的遮蔽,而使《诗经》重现诗的精髓的现代解诗者。他以现代诗家的眼光和魄力,摆脱统治意识深处的以道德为首的儒家解诗传统,对每一首诗都发出这样的追问:“艺术在哪里?美在哪里?情感在哪里?诗在哪里?”在闻先生的努力下,《诗经》中的许多诗都实现了由神性到人性的复归,由“非诗”到“诗”的复归。比如《采芣苢》,闻一多先生通过独到的考辨疏证,得出一个令许多人都异常惊诧的结论——采芣苢是原始时代性本能的演出,《采芣苢》是母性本能最赤裸最响亮的呐喊。

闻一多先生摆脱儒家诗教传统的束缚,去掉理学家们强加在《诗经》头上的道德光环,使《诗经》还原于诗的解读,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文学解读要摆脱以道德为首位的传统,是需要勇气和见识的;文学解读时的道德强渗不但无益于解读,还会使文学失落于道

德的迷雾之中而无从辨识。

比如《雷雨》,讲到鲁侍萍撕支票,不少教师总会把她的这一行动上升到很高很纯的道德层面来分析,有的教师甚至以为鲁侍萍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她的这一行动成就了感人的“圣者”的形象,至今闪耀着反拜金主义的光辉。初听起来挺新鲜也挺在理,但细细琢磨一下,却有现代道德强渗之嫌。想一想,生活之中到处都有类似的现象,即孟子所说的“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不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何况鲁侍萍这么一位在生活的磨砺之下崛起的女性呢?鲁侍萍的撕支票,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最本质的也是最普通的生命“本性”的展现。鲁侍萍“此处”的所为,没有什么可特别让人关注的,只不过是一个不屈女性“该出手时就出手”罢了。如果硬要在这里强调对学生的道德教化,笔者以为让学生阅读全剧,最好是让他们排演该剧,进入到具体的剧情之中,作深切的生命体验,他们便可在真切的感知过程中得到“无声”的熏陶了。否则,在学生没有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对他们作高远空洞的道德强渗,不仅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更可能使学生离鲁妈而远去。

无可否认,文学作品在陶养心性、培养美好的道德情操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种作用往往是阅读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产生的,并非外力所能强加的。而当下我们的文学作品教学却常常把道德渗透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文学解读活动中强行渗透对学生的理想教育、奋斗教育、崇高人生教育。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正好与预设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文学作品那具有生命质感的鲜活语言被凝滞僵化、苍白干瘪的道德说教所遮蔽而丧失其感染力;充满活性、充满灵性的文学形象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空泛的理性雾障而无法感受;蕴含在作品中的生活之美、生命之美等等种种原本撼人心魄的美,因笼上了所谓的道德的神圣光环而不能彰显出来,因而也就不能起到文学作品教学所应起的作用。

我们以为,很多同学在谈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时,只有标签式的那么几句大同小异的“道德修养共同语”,而没有自己独特真切感受,没有自己真实生动的发现,最终是没有美的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的语文教学长期以来的道德强渗相关联的。

三

明人杨慎评论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时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的话一直为人们所讥笑。何以被讥笑?就在于杨慎用科学阉割了艺术。

杨慎式的评论在我们今天的语文课堂有没有?笔者以为不但有,而且相当普遍。长期以来,语文阅读教学采用“文章学阅读教学法”,以知性分析为主,常常将课文作“生理解剖”。近几年,很多人不满这种方法,纷纷亮出自己的招术,其中以信息论为理论指导的“信息处理”法似乎颇受重视。应当承认,“生理解剖”法对文章学知识的传授有独特的意义,“信息处理”法对培养、提高学生处理文章信息的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生理解剖”法,还是“信息处理”法,若将其用之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则都有科学主义之嫌,其结果必然导致科学对艺术的阉割。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令人回味无穷的优美的散文。“秋味”是文章的“关键词”,“从开篇第一段即提出‘故都的秋味’,以后各段里不断重复(强调):‘秋的味’,秋雨‘下得有味’,文人写得‘有味’,‘秋的深味’,秋的‘回味’……一贯到底,确实让人‘回味’无穷。”(钱理群《品一品“故都”的“秋味”》)但若如一些教师用“生理解剖”法和“信息处理”法对文章进行结构解剖和信息处理,则“索然寡味”了——

“生理解剖法”的前提是把文章分成各种类型、各种模式,即在解读之前就将充满个性、风格多样的活生生的文学作品,预设成解读者心中的“理想”模式,然后“按图索骥”,把那个“理想”模式寻找出来,甚至在寻找不出来时就根本不顾作品的实际而强行“演绎”出来。这种方法显然是将文学作品的艺术个性给牺牲掉了,或者说给阉割掉了。上述对《故都的秋》的解读,就是把这篇散文分解成“总写”“分写”“总结”三大部分,即“总——分——总”的结构模式。按这种模式去解读,天下文章有一大半根本不需要动任何脑筋就能解决了,还谈什么“灵魂的冒险”?

“信息处理”法则将文学等同于科学,将具有强烈个性色彩、具有丰厚文化承载和浓厚审美意味的文学语言,等同于平面、粗浅、没有意趣的纯技术符号;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系统的信息集,以期通过识码、解码、选码、编码达到对它的有效理解和把握。以这种方法解读文学,则是完全抛弃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本质,而将文学科学化,是对文学作品教学根本目的的反动。上述对《故都的秋》的解读,把非常感性、非常个性的郁达夫式的语言抽象成了干巴枯涩的几根“棍子”。用这种方法去解读,文学就在解读之中消失殆尽。有人曾建议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

用扼要的文字概括出来,他断然拒绝,说:“如果我想用文字说出我打算用长篇小说来表达的一切,我就得从头开始写出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的话我们应当记取。

长期使用这两种方法解读文学的结果,按美国学者罗伯特·达纳的话说,就是使大家“对诗歌(可指称整个文学——笔者注)彻底麻木不仁了”(《诗的不公》)。

四

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作品绝不是政治课本,绝不是德育教材,绝不是科学讲义。闻一多先生曾高呼“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我们今天也要高呼——“用文学的眼光读文学!”怎样才算“文学的眼光”?我们可以从狄尔泰的两段话中得到一些启示——

“最伟大的诗人的艺术,在于它能创造一种情节。正是在这种情节中,人类生活的内在关联及其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这样,诗向我们揭示了人生之谜。”

“诗与生活的关系是这样的:个体从对自己的生存、对象世界和自然的关系的体验出发,把它转化为诗的创作的内在核心。于是,生活的普遍状态就可溯源于总括由生活关系引起的体验的需要,但所有这一切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自己对生活意义的反思。”“诗并不企图像科学那样去认识世界,它只是揭示在生活的巨大网络中某一事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或一个人所应具有的意义。”

狄尔泰在这里所说的“诗”,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包括所有文学样式在内的一切艺术。社会的变乱,人生的沉浮,人际关系的种种纠葛,朝廷政治的倾轧斗争,外敌入侵的民族灾难……这些都可以通过作家的独特体验而交汇为某种特定的人生意义之谜,并最终伴随着作家的审美发现而凝结为充满文学光芒、穿越时空屏幕的审美形式。这样,用来解读文学的“文学的眼光”就应当是审美的眼光,应当是破译“人生之谜”的眼光。因为作品中的“人生之谜”是“作家的独特体验”的“交汇”,所以这种“文学的眼光”还应当是伴随着强烈的生命体验的眼光。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学的眼光”解释为“伴随强烈生命体验的审美眼光”。作为文学的解读,就应当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那样去追寻:“艺术在哪里?美在哪里?情感在哪里?诗在哪里?”这就要求我们在引领学生解读文学时,尽可能地去除政治泛化、道德强渗、科学阉割的三重障碍,而以生命体验的方式化入作品之中,去破解“人生之谜”;以审美的眼光化出作品之外,发现、感受生命与生活之美,最终获得人生的启迪,实现生命的重塑。

少读「架子书」

盛海耕



“架子书”这个名称是朱自清先生的创造。1934年，朱先生写有《论青年读书风气》（《朱自清全集》卷四，1996，江苏教育出版社）一文。文章说，五四以后，发现了自我的青年们求知心切，拼命读书，可是书籍浩如烟海，一本本读，哪里读得过来？于是，急于求成的他们希望有捷径可走，要求出版一些“系统”而“简要”的东西，以便他们读了某一本书就能知道某一种学问的全貌，掌握某一门知识。这样，“大纲”“概论”“小史”之类就应运而生，越出越多，乃至泛滥成灾。这些“玩意儿”靠“抄抄编编，改头换面”而成，不是拾人牙慧，就是蹈空立说，架子大，内里空，“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然而青年们觉得这些东西“系统全，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竟把这些空架子“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他们“靠在这架子上作文，演说，教书”，暗自欢喜，以为真的找到了求学谋生的捷径。其实，青年们是上了大当了——

这种转了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拧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机会，还养成近功抄小路的脾气。长此以往，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重视。据我所知，当今我国语文教育界“架子书”的泛滥与横行，较之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横行，那就是你不愿读也得读。我指的是大批大批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在“进修”和“培训”过程中的遭遇——发给他们读的教材，有相当多的就是架子书，讲给他们听的课，有相当多的就是架子课。那些“美学概论”“文学史”“写作教程”……大多是一些大同小异的东西，有真知灼见的极少。那些十几家乃至几十家合作编写的“协作教材”尤其要不得，大多是大杂烩。著书立说是一种独立的个体精神劳动。它要求作者对所论问题有

深厚的研究心得、有一以贯之的独到见解，行文的个性与风格前后一致，从而自成一家的言。“架子书”的编写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那些“参编者”虽不是胸无点墨却也是积累无多，他们最缺少的是自己的治学心得和见解，因而根本无力独自写书；更无可救药的是，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和耐心从事某种学问的研究，遑论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以独立完成某部著作。他们只是为晋升职称或为应付学校规定必须完成的“科研”任务而“搞科研”，于是耍小聪明走捷径，或独自一人拼拼凑凑“编著”只有几条筋而无血无肉的“简史”，或多家多人合作经营看似血肉丰满其实绝少学术含金量的大部头“著作”。他们往往以发“教材”的名义将架子书发给参加进修和培训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不仅如此，学员们还得去“背”这些空洞无物、面目可憎或人云亦云、平庸乏味的东西以应付考试。另外，凡善于炮制架子书者，上出来的课也必是“架子课”。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泛滥，指的是“架子书”充斥于书店、图书馆和教师家中的书架书橱。书店和图书馆里的架子书跑到教师们的书架上去，当然是教师们自己去请来的。这就怪不得别人了。一些教师除了关心教参、模拟考卷、习题集之外，感兴趣的，就是“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的架子书了。更准确些说，由于长期受“架子书”和“架子课”的影响，他们已经“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自然而然地愿意亲近架子书了。

当然，问题不在名目，而在实质。“大纲”“概论”“小史”之类名目本身，决无什么罪过。在这些名目下，照样可以写出好

书来。朱先生自己的《经典常谈》，不就是这类书的典范吗？关键在于，写这种书的人，一要学有专长，二要认真负责。事实上，这样的好书，还是很有一些的，可惜的是，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朋友们对它们知之甚少。我这篇文章旨在提醒大家远离“架子书”。第一步，是少读“架子书”，然后，慢慢做到不读“架子书”。否则，咱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在语文教师，也就永不知道语文教育为何物。

文言文是“作品”，而不是“语言材料”

陈小英

近几年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听到关于文言文教学的种种批评，最集中的意见是，文言文教学应该放手让学生读背，不必讲析。似乎今天的语文教师太不聪明，放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捷径不走，偏偏自作多情，好为人师。首先声明，笔者决无排斥读背吟诵之意，恰恰相反，我们多么企盼学生能在“读书百遍”的过程中自己感悟体会，融会贯通啊。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学生已经生活在中外文化交融的时代，既没有文言的语境，又没有“读书百遍”的时间（连五遍都做不到），假如教师不在语文课上为他们的学习铺路搭桥，点化迷津，那么即使学生能把古诗倒背如流，又有什么意义呢？

笔者曾经作过这样的调查，两个48人的班级，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名句的有78人，但能理解其含义的仅2人。假如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最终仅仅是让学生机械地背了百十篇文言诗文，也不过是死的知识，只供炫耀或应考，离文言文教学的初衷实在相去甚远。因此，我认为，文言文教学只抓读背吟诵是不够的，教师的讲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讲”文言文，怎么“教”文言文。值得研究的东西太多，我的最大感受是，要把文言文当“作品”教，而不仅仅当作语言材料去处理。

如果当作语言材料，那么，我们只需关注字义词义和语法关系，这样就剥离了鲜活的血肉，剩下的只是风干的语言标本，学生当然食之无味了。

当作文学作品呢？就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那么，教学效果就可能完全改观。

1. 挖掘作品本身的文化因素，拓展相关知识背景，使课文丰厚起来。

比如教《鸿门宴》，把它当作文学作品看，那就得始终紧紧抓住人物形象做文章。“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为”字，作介词，译作“为了”或者“替”（省略宾语“之”），句子都通。但从人物性格出发，当取第二解，前与两军兵力悬殊的交代暗合，后与“击破”之“破”呼应，充分刻画了项羽的霸王之气，轻敌之态，实在是太

史公的神来之笔。不注意此处这种“不着一字”而“霸气”出足的神韵，就不能深刻理解项王鸿门宴上不顾范增多次暗示，终于不杀刘邦的深层心理动因，还以为项王真是“为人不忍”呢。

联系历史背景，可以知道就在鸿门宴之前，项羽刚刚与秦军精锐部队“战于河北”，结束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巨鹿之战”，“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史记·项羽本纪》），有什么“为人不忍”呢？教师抓住课文这一历史背景知识的扩展，就能引导学生感悟项羽终于不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的第二个深层心理动因：项羽刚刚活埋了二十万秦军士卒，已经很不得秦地百姓的民心，倘再杀了“劳苦而功高如此”、尚未有背叛把柄的刘邦，那就彻底违背了诸侯间的盟约，进一步失去天下诸侯的心。由此可见，鸿门宴上，几次“默然无应”“亡以应”的项羽决非反应迟钝、思维木讷，他的心中应是波涛汹涌，翻江倒海，最后终于手下留情，放刘归山，实在迫于当时形势，属于大智若愚，当然其中也不乏盲目轻敌的心态。从太史公对项羽的偏爱来看，他也不可能把项羽写成一个毫无谋略，优柔寡断的草莽英雄。

以上对《鸿门宴》的解读纯系个人感悟，不一定对，我只想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只有把文言文当文学作品来解析，“教”才是有意义和有兴味的。

2. 品味鉴赏古代文学大师们细致入微的感受力、想像力，磨砺在快餐文化中成长的一代人的感受力和审美能力。

今天的中学生吃文化快餐长大，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力已经严重缺失，审美情趣趋于低俗，情感触觉迟钝，不能敏锐感觉和体验人性世界的多彩丰富，这将影响到他们终生的精神生活质量，新教学大纲在教育目的中提出“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正体现出教育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语文教师更应该当仁不让。

明代学者钟惺在《诗论》中说“诗，活物也”。意思是说，诗不是字，不是词，而是诗人用字词组成的生命。她明眸皓齿，白皙的肌肤下流淌着鲜红的热血，强健的筋